

短评快 关于“冷战” 默克尔说了句大实话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警告欧洲不要对中国采取孤立、隔离的态度。她认为,孤立和隔离这种“冷战”时代的做法,不适用于处理今天的对华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出于各自政治目的不断鼓吹兜售“孤立”“冷战”等概念。欧洲这个曾经的冷战前沿,对冷战的危害记忆犹新。理性的人们,自然会对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感到反感。默克尔说的大实话,是对历史教训的理性反思,反映了欧洲大多数人的看法。

对冷战和对抗思维的反感与批判,不仅仅出现在欧洲,而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长时间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相互融合越发深入,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从中受益。一些鼓吹冷战思维的政治势力,逆大势而行,试图撕裂这种融合进程。

冷战思维要把世界割裂成彼此对立的阵营,并强迫他国选边站队。对于这种做法,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感。对鼓吹所谓经济、科技“脱钩”,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脱离现实。

今天的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开放持续深化,是任何希望持续发展的国家不愿放弃的合作伙伴。频繁访华的默克尔,“每年至少访问一次中国”的马克龙,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大利,深入发展的“17+1”合作机制,无不表明欧洲人希望深化对华务实合作。当前欧洲经济活力不足,面临来自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打压,发展对华互利合作是符合欧洲利益的务实之举。一些抱持“冷战思维”、煽动“中国威胁”的势力,定然阻挡不了这种带来共赢的合作。

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鼓吹“孤立”“脱钩”,企图搅动冷战沉渣,只会被时代抛弃,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一种说法 对培训机构“套路跑” 就该亮出刑法之剑

史洪举

今年5月中旬,上海培训机构巧恩英语一夜之间全部门店关门停业,让几千名预付了高额学费的学员和家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打了水漂。11月29日,上海警方发布消息称,经过公安、检察机关缜密侦查,揭开了巧恩“经营不善”谎言背后的真相。“巧恩英语”已被警方以合同诈骗立案侦查,检察院近日已对机构负责人李某霞批准逮捕。

人们对预付卡和预付款都不陌生,小到理发卡、洗车卡,大到健身卡、培训卡、美容卡,多数人都可能会有几张。这本来是消费者为了获取优惠而提前预付的一定款项,但屡屡发生的一些商家在圈钱后关门跑路的现象,无疑让消费者很受伤。对此,理当强化预付卡领域执法监管,并将明显“套路跑”作为欺诈和诈骗予以惩戒。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8月印发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校外培训机构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此外,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企业发行预付卡时应当备案,应对预收资金严格管理,仅能用于发卡企业主营业务,终止兑付时应提前30日在媒体上公示。

但遗憾的是,很多商家根本没有遵守相关规定,一些预付卡完全成了“套路卡”“圈钱卡”,一些跑路的商家显然不是不讲诚信那么简单,而是存心欺诈,恶意圈钱。如一些商家明知自己经营不善,资质不全难以维系,却以巨幅优惠诱导消费者交纳高额预存款,圈到财物后则一跑了之。这样的套路远比普通诈骗更加迷惑人心,陷阱更深、危害更大。

随着人们防骗意识的提升,很多人已经能够识破传统诈骗的伪装。而培训机构的“套路跑”,受害者大多数是有着一定文化知识和法律意识的家长,他们怀着提升子女能力和特长的憧憬交纳高额预付款,却遭遇无情的欺诈和圈套,无助和无奈之情可想而知。

“套路跑”绝非普通民事纠纷那么简单。如商家存在欺诈行为的,应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信用卡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可能构成犯罪,侵占他人财物拒不退还的,则可能构成侵占罪。举轻以明重,“套路跑”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相关部门理当积极作为,对“套路跑”行为亮出刑法之剑并形成常态化打击态势,让投机取巧、毫无诚信的奸商无立足之地,让消费者不至于总是被“圈钱”。

人脸信息安全问题要抓早抓小

本报评论员 樊大猷

今日社评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而人脸识别作为人工智能中的重要技术,被越来越广泛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脸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个人信息,它既可以用于刷脸支付,也可以用于安防准入等场景。近日,据央视调查,如此重要的个人隐私数据信息,却在网上被公开兜售,网上销售的“人脸相关算法训练数据集”,包含5000多张人脸照片,很多还是一个人不同表情的脸部照片。

人脸识别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各种支付系统纷纷采用人脸识别技术,新一代手机则用刷脸解锁替代了指纹解锁。人脸成为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关键信息。然而,在人脸识别技术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人们对于这项技术安全性的担忧也逐渐增长。

个人信息泄露是近年来形成的突出社会问题,身份证号码、住址、手机号、社交账号、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数据频频在网上被售卖,甚至存在一条相关灰色产业链。如今,相比传统个人信息而言,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支付,是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人脸识别在安防领域、寻找失踪人员、重要场合快速安检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确保消费者的人脸信息不被非法采集使用甚至交易,才能帮助用户获得更好的体验,让社会树立对人脸识别的信心,才能促进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不断与其他新技术融合。

更为敏感的人脸信息也开始被上网售卖,这不禁令人高度警惕。人脸是具有唯一性的生物信息,一旦被复制后会给个人用户带来很大潜在风险。如果不法分子将人脸数据与其他个人信息数据结合,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则可能产生严重违法后果或财产损失。

人脸识别在安防、金融、教育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遍,涉及门禁出入口、人员识别、消费支付等方面。截至目前,还未发现因人脸信息泄露而造成的严重事件,但其数据泄露造成的技术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人脸识别作为一种生物识别技术,

其数据库外泄将导致重大安全隐患。传统密码被泄露,可通过重新设置实现密码更改,但人脸的生物特征信息唯一且终身不变,一旦泄露后患无穷。

首先,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法律法规要及时跟进。有关部门应该及早厘清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边界,对人脸信息数据库的采集、管理、运用做出明确的法律规范与约束。对于企业而言,则需要加大软硬件设备投入,促进相关技术进一步成熟可靠,同时,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用户生物识别信息的使用安全,确保人脸信息不被滥用、不被泄露。

马晓霖专栏

“什叶派之弧”内乱与外力裹挟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西溪学者(杰出人才))

11月28日,伊拉克示威者抗议伊朗干涉内政并焚烧伊朗驻纳杰夫领馆,引发冲突并造成47人受伤。这个事件因具有典型的什叶派内江色彩而充满戏剧性,甚至被人形容为伊拉克什叶派国家认同的重新回归。一个多月来,从黎巴嫩到伊拉克再到伊朗,打通地中海与波斯湾的“什叶派之弧”相继陷入大规模反政府骚乱,“内因说”与“外因说”不一而足,众说纷纭。

尽管美国支持街头革命从来都不阴谋而是阳谋,也一直希望拆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之弧”,但是,这场空间与时间跨度均较大的地区动荡,既有内生性草根革命的驱动,也有外生性煽风点火的发酵,无法用“阴谋论”简单而论。纳杰夫的反伊朗暴力行为则进一步表明,中东当前派系和阵营博弈是主要特点,但是,并非所有冲突都可以简单地用派系与阵营视角来判断。

“什叶派之弧”三国动荡一波又一波,既有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又有外部地缘政治因素,而导致动荡的根本性因素是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内部矛盾中经济问题又是关键,然后才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或曰经济危机引爆社会乃至政治危机。外部的地缘关系撬

动只不过是社会动荡的催化剂,是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

10月初,伊拉克多城爆发示威,抗议者矛头指向高失业率、高物价及政府腐败和行政效力低下。尽管当局采取了部分纠正政策,危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在10月下旬升级演变为严重骚乱,导致104人死亡,6100多人受伤。数万抗议者还冲击美国大使馆,抗议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对现政府的控制。联合国统计表明,伊拉克战争结束15年来,仍有1/4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轮示威骚乱的主体是萨达姆政权垮台的政治受益者什叶派而非逊尼派,本身就表明生计比地位更重要。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反伊朗骚乱,则预示着伊拉克骚乱进入第三季,变成超越经济、社会问题和教派分野的民族主义行动。

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决定对油品、烟草和奢侈品征税,对社交平台WhatsApp通话收税并增加税制,引爆大规模抗议。尽管政府被迫撤回成命,民众不满却已转向公款浪费和贪污腐败,并问责政府无力解决陷入已久的经济危机,包括高达860亿美元的外债。经济危机导致总理哈利利于月底辞职,但哈

利辞职并未化解经济与社会危机。近日,示威者与伊朗代理人真主党卷入暴力冲突,真主党支持者甚至围攻美国大使馆,表明政治危机也在进一步加剧。

11月15日,伊朗政府上调燃油费50%也引发百城抗议活动,一如2018年底那场风波,示威者很快将矛头指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共和制,要求进行深刻政治变革。这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最后也演变为街头暴力和骚乱,伊朗政府宣布全国断网,动用军警进行镇压,抓捕180多名“暴乱”负责人,以及1000多名参与暴乱行为的示威者。

黎巴嫩真主党和两伊政府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美国对骚乱负责,美国也难以自证清白。黎巴嫩是美国二战后取代英法进入中东就一直施加影响的小国,曾两次派遣特种部队确保不同教派平衡和维持稳定,以利以色列安全。2005年美国利用前总理老哈利利遇刺策动“雪松革命”,迫使叙利亚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2011年以来,美国更是通过沙特扶持老哈利利之子领导的穆斯林逊尼派政府对抗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什叶派真主党。因此,黎巴嫩这波民生危机最终演变成涉地缘政治冲突并

在立法工作与科技企业齐头并进,承担源头管理责任的同时,广大用户也必须提高保护自己人脸信息的安全意识,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来源不明的美颜、人脸测试、皮肤测试等硬件产品或手机小程序,对各种采集人脸信息的产品,应用都需谨慎对待,保持应有的警惕,防止个人生物信息被不法分子掌握。

当然,社会在重视人脸信息安全风险的同时,也不必因噎废食。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支付,是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人脸识别在安防领域、寻找失踪人员、重要场合快速安检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前生物识别技术迅猛发展,人脸识别作为一项具有很大市场价值的技术方兴未艾。此时,对人脸信息安全问题要抓早抓小,要及时从源头上防止技术被滥用,从根本上防止人脸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只有确保消费者的人脸信息不被非法采集使用甚至交易,才能帮助用户获得更好的体验,让社会树立对人脸识别的信心,才能促进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不断与其他新技术融合,催生出更多应用,促进人脸识别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马建红专栏

“正己修身”与“以法治吏”

马建红(法学博士)



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服务于各级政府的管理者,而吏治的清明与否,则直接影响着社会风尚的好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吏治对社会治理的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历代王朝的专制君主们也深以为然,不仅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吏治思想,而且还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吏治制度。这些思想和制度,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留给后人的一笔独具一格的法律文化遗产。

关于“吏”的概念,《说文解字》中有“吏,治人者也”的解释,而一般人则将“吏”理解为“古代大小官员的通称”,他们是民之“父母”,就和牧人放牧牛羊一样,所以也被称为“牧民官”。官吏是否奉公守法、清正廉明,直接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存亡,因此,没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等闲视之。

先秦时期的儒家两家,尽管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主张有诸多差异,不过在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上却又殊途同归,不同之处在于两家所选择的“路径”相异罢了。儒家强调德治与礼治,但这两种“治”,实际上都离不开“人”,因而儒家非常重视人的作用,尤其是当权者与各级官吏的表率作用。孔子的主张,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希望为政者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认为只要当权者自己认真地遵守礼仪法度,民众就会群起效尤,国家也就能治理好了。依据政治上上行下效的定律,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洁身自好,清正廉明,则是国家形成良好吏治的关键,它还可以造就一种比较纯正的社会风气。

如果说儒家的“吏治”,在于强调为政者个人的“修身”,希望用规范性较弱的“软法”即礼来约束各级官吏的话,法家则更注重可操作层面的“法治”的重要性,强调“刚性”的法律在吏治中的作用。比如商鞅所持之观点,“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不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讪之上者,自勉于罪,尸戮其官长之官爵田禄。”希望通过赏罚分明,不赦不宥的方法,管理好官吏队伍,充分发挥官吏的作用。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更强调君主主要通过“施赏不迁,行诛无赦”来驾驭官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效忠于君主,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韩非明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主张,他认为这种方法好比“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摇木之本,则枝叶必动;引网之纲,则万目必张。只

有首先实现吏治,而后方能做到“民治”,他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其重要性:“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即通过吏的“操鞭使人”,来达到“役使万夫”的目的。先秦儒家柔性的“修己安人”,与法家刚性的“以法治吏”,被后世君王奇妙地组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吏治方法。一方面,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爱、民本思想成为选官用人的标准,而在科举取士成为入仕“正途”的朝代,儒家思想则通过考试的方式得以强化。另一方面,法家的“以法治吏”,则通过官吏的选拔、任用、职责、考核、升降、奖惩等一系列环节,以制度的形态得以固化。通观历史上的那些“盛世”时期,无论是汉朝的文景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之治,抑或清朝的康乾盛世,统治者大都注意

把以法治吏放到为政的首位,采用各种办法来防止官吏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因而也成为吏治较为清明的时期。

古代的吏治经验中,比较侧重于选拔任用与监督检查这两个环节上,对官吏加以防范。在选官的环节,科举考试在明清时期虽然形成了较深的积淀,不过这一制度大抵上仍能在选贤任能、去贪汰劣、堵塞品行恶劣者从政的门路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而在监督检查的环节,则既有一些常规性的举措,以防止各级官吏违法乱纪、巧取豪夺,并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及时加以清除,以德恶扬善,赏勤罚懒,不断激励官吏的进取心,也有行之久远的专门性、经常性的监察制度,从秦朝开始发端,由后继的各个王朝不断发展,至明清时期臻于完善的御史监察制度,就其发展脉络清晰、制度设施完善、结构体系完备而备受瞩目,并因此而形成了吏治中可资借鉴的珍贵传统。

应该说,古代的“明主治吏不治民”指导原则之下的吏治,相对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这就是各级官吏只对“明主”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这种由上而下的监督体系也就难免失灵。欲使吏治真正清明,还需依靠来自民众与舆论的监督,而古代社会的这一“短板”,在今天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则可以补足。当代吏治环境的改善与突围,或许正应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开始。

漫画/陈彬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主编/傅强 责编/李霞 编辑/刘宇 校对/百晓峰